



我的父亲 梅兰芳

梅绍武 著

下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我的父亲

梅兰芳

梅绍武 著

下



中華書局

目 录

上 册

表

——童年的一段遭遇	(1)
第一次风险	(5)
第一次访问香港	(13)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里	(33)
传播京剧艺术的使者	
——早期介绍京剧艺术给国际友人的实况	(49)
中印金兰谊 绵延千载久	
——忆父亲和泰戈尔的友谊	(56)
赠石订交万里盟	
——和瑞典王储五十年前的一次会见	(63)
梅兰芳和日本	(69)
附:梅馨远流樱花国	
——1924 年日本《演剧新潮》杂志社邀请著名戏剧家为梅兰芳 举行座谈会(速记稿)	(98)
五十年前京剧艺术风靡美国	(116)
梨园影坛两大师	
——忆父亲和卓别麟的友谊	(142)
深切的怀念	
——忆父亲和保罗·罗伯逊的友谊	(153)
艺人最重千金诺	
——忆父亲和美国先驱影星范朋克夫妇的友谊	(160)

梨园泰斗和百老汇主教

——记父亲和大卫·贝拉斯科的会晤	(171)
梅兰芳·肖恩夫妇·《霸王别姬》	(178)
观梅剧受益甚多的美国单人剧大师露丝·德雷珀	(191)
梅兰芳和美国工人“活报剧”	(196)
为祖国争光	

——忆父亲荣获美国两家高等学府颁发的博士学位	(201)
梅兰芳和波摩那学院	(209)
胡适的一篇佚文:《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215)
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222)
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一览	(230)
梅兰芳和肖伯纳	(241)
沟通文化 促进邦交	

——记父亲首次访苏时的题词和通信	(251)
一尊列宁塑像	(256)
梅兰芳和高尔基	(262)
《梅兰芳和高尔基》补遗	(269)
梅兰芳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272)
梅兰芳和爱森斯坦	(279)

下 册

梅兰芳和布莱希特	(297)
梅兰芳与新加坡一段缘	(303)
有乡先生能赏音 折节交到忘年深	
——记父亲和张簪先生的深厚友谊	(310)
京昆艺术两大师	
——忆父亲和俞振飞的友谊	(323)
《天女散花》和徐悲鸿	(332)
梅兰芳与丰子恺	(338)

附：访梅兰芳	(343)
梅兰芳和黄佐临	(347)
傲骨从来耐岁寒	
——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	(352)
附：梅兰芳曾留过胡子	(359)
“把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场中占一个优胜的位置”	
——记父亲创办国剧学会	(364)
功夫何止冶花衫	
——忆父亲对昆曲的提倡与钻研	(372)
奏艺氍毹数十春 音容笑貌五洲存	
——忆父亲的艺术生活	(382)
坚贞柔婉的虞姬	
——忆父亲演出的《霸王别姬》	(388)
绚丽多采的手姿	(397)
脾气并不随着能耐长	
——忆父亲的戏德	(404)
万花如锦春莺啭	
——忆父亲如何保养嗓子	(413)
艺术青春常在的奥秘	
——忆父亲为艺术而锻炼身体的二、三事	(418)
和王琴生先生的一次谈话	
——忆父亲的表演艺术及其他	(424)
和王琴生先生的二次谈话	
——续谈父亲的表演艺术及其他	(445)
泰州寻根记	(480)
读父亲三篇旧文有感	(488)
附：诚意来应付，虚心来研究	(493)
登台杂感	(495)
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497)
“梅学”在国外	(498)

我的父亲梅兰芳

附：艺术的强大动力

——1935 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为梅兰芳

举行座谈会(速记稿) (505)

附录：梅兰芳的故居 (519)

附录：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 (531)

附录：梅 兰 芳 (542)

附录：梅 兰 芳

——西方舞台的诉讼案和理想国 (555)

梅兰芳记事(1955 年 1~5 月) (562)

梅兰芳和布莱希特

自从一九七九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黄佐临同志导演的《伽利略传》之后，人们对当代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选》，不少学者在研究他的戏剧理论和他对世界戏剧发展的影响。国际上自七十年代初也出现了一片“布莱希特热”，国际性的布莱希特学术讨论会经常在各地召开。

但是，中国古典京剧以及我父亲对布莱希特的影响似乎论述得不多。记得一九七八年冬，我在广州参加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时，有一位专攻德国文学的朋友向我打听道：“令尊解放前当真去过苏联？”我一时感到诧异，问他为何对此产生怀疑。他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年北京某大学聘请了一位德国戏剧专家来讲学，他在一次讲堂上谈到布莱希特卅年代曾在苏联看过梅兰芳的京剧，甚表折服，并从中汲取了不少养料运用到他后来的剧作中去。下课后就有些同学议论纷纷，认为这位专家大概是在胡扯，梅兰芳解放前怎么可能去过苏联呢，又怎么会影响布莱希特呢？

其实这也不能怪年轻同学提出这样的疑问。“四人帮”把祖国优秀的传统戏曲禁锢了十



梅兰芳在苏联演出时在舞台上

几年,新一代青年对京剧确实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对我父亲为了使京剧跻身世界戏剧之林而毕生所作的努力自然也就相应缺乏了解了。

佐临同志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戏剧观比较》的论文,全面论证了我国传统戏曲的八大外在和内在的特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指出在运用戏剧手段方面,京剧艺术高超之处并不逊于任何西方戏剧。这篇卓越的比较研究的论文无疑有助于人们,尤其是青年朋友,对祖国传统戏曲的实质加深理解,同时也会使我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

那是在一九三五午,父亲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盛情邀请,把京剧艺术介绍给苏联人民,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了十五场。当时,布莱希特受希特勒的迫害,正在苏联政治避难。他观看演出之后,对京剧确实着了迷,就在次年写了一篇《论中国戏曲与间离效果》的论文。佐临同志说,布氏在那篇文章里“狂赞梅兰芳和我国戏曲艺术,兴奋地指出他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却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梅先生的精湛表演深深影响了布莱希特戏剧观的形成,至少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布莱希特素来主张破除舞台上的真实生活幻觉,要求演员、角色、观众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万不可合而为一,他不赞成演员或观众过于受感情的支配,以致不能理智地思考,不能冷静而科学地认识剧中的生活现实,从而也就不能改造生活,改造现实。他一直在寻求一种理智和感情相结合的辩证的戏剧,因此他一看到我父亲表演的京剧不是把生活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而是把生活加以提炼、集中、典型化之后,艺术地再现于舞台,就十分钦佩地赞扬道:

这种演技比较健康,(依我们的看法),它和人这个有理智的动物更为相称。它要求演员具有更高的修养,更丰富的生活知识,更敏锐地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力。当然这里仍然要求创造性的工作,但它的质量比迷信幻觉的技巧要提高许多,因为它的创作已被提到理性的高度。

早在四十多年前,布莱希特就一语道破了我国传统戏曲的主要特征和

精神实质，真可说是独具慧眼。

布氏对《打渔杀家》这出戏尤其惊叹不已。他认为，京剧手段比运用状似真船真水的大块布景道具的西洋戏剧手段，要高明得多，也灵活巧妙得多。他描绘道：

一个年轻女子，渔夫的女儿，在舞台上站立着划动一艘想象中的小船。为了操纵它，她只用一柄长不过膝的木桨。水流湍急时，她极为艰难地保持身体的平衡。接着小船进入一个小湾，她便比较平稳地划着。就是这样的划船，这一情景却仿佛是很多民谣所吟咏过的、众所周知的事。这个女子的每一动作都宛如一幅画那样令人熟悉；河流的每一转弯处都是一处已知的险境；连下一次的转弯处也在临近前就让观众觉察到了。观众的这种感觉完全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而产生的；看来正是演员使这种情景叫人难以忘怀。



梅兰芳(左)演《打渔杀家》

值得注意的是,我想,布莱希特特别赞赏《打渔杀家》,恐怕还因为这出戏具有反抗暴虐势力而奋起斗争的积极意义吧。当时,希特勒攫取了政权,布莱希特被迫离开了祖国,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但他一直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创作了大量反法西斯的诗歌、剧本和小说。一九三七年,他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而写的独幕话剧《卡拉尔大娘的枪》,有可能受到《打渔杀家》这出戏的启发。《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或《讨渔税》,是根据《水浒后传》中李俊事迹改编而成的,情节为“阮小二易名萧恩,与女桂英打鱼为生,遇梁山故友李俊与倪荣来访,同饮舟中。土豪丁自燮遣家奴催讨渔税,李、倪斥之。家奴回报,丁又遣大教师至萧家勒索,被萧恩痛殴而逃。萧至县衙首告,反被赃官吕子秋杖责,且逼萧恩过江至丁府赔礼。萧恩忍无可忍,携女黑夜过江,假献庆顶珠为名,闯入丁府,杀死其全家”。《卡拉尔大娘的枪》描写一个渔家善良的妇女,因为丈夫已在反佛朗哥斗争中牺牲,而希望保住自己两个儿子的生命,便企图超脱政治,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她的儿子后来在打鱼时也平白无故地遭佛朗哥匪军枪杀,这才迫使她醒悟,丢掉幻想,拿起武器,奋勇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两剧的主人公同样是遭受恶势力残酷迫害的渔家。



梅兰芳(左二)在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艺术家俱乐部讲话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艺术家俱乐部，当时还曾邀请我父亲作一次有关中国戏曲的学术报告，他便去讲了一个多小时，当场示范表演了各种手势、步法和歌唱。前去听讲的大都是各剧院的著名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听完之后感到受益匪浅，誉他为“大师中的大师”。布莱希特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并说：

除了一两个喜剧演员之外，西方有哪一位演员，比得上梅兰芳，穿着日常服装，在一间挤满了专家和评论家的普通客厅里，不用化装，不用灯光，当众示范表演自己舞台艺术的各种要素而能如此引人入胜呢？

五十年代末，我曾问父亲记不记得布莱希特，有没有同他在苏联合影。他想了想说，倒是记得同另一位德国剧作家艾尔文·皮斯卡托有过交往；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在为他拍摄《虹霓关》片断时，皮斯卡托也在场观看，三人曾合影留念。皮斯卡托是廿年代为创立具有高度政治倾向的无产阶级戏剧而进行“时代戏剧”实验的创始人，他的实验曾给予布莱希特很大启发，成为后者所创立的“史诗剧”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显见皮斯卡托是布莱希特的前辈，当时在声望上要比后者高。

但是，我总希望能找到父亲当年在苏联访问时一些照片，也许在一些聚会中会有布莱希特在场，从而可以帮助解除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些同学的疑问。最近在翻阅旧《良友》杂志时，我欣喜地发现了戈宝权先生一九三五年在苏联拍摄的一些照片，



梅兰芳(右)和爱森斯坦(左)、皮斯卡托(中)合影

我的父亲梅兰芳

其中有多幅真实地记录了我父亲访苏时的情景，尤其珍贵的是也包括他那次作学术报告时的场面。您看，前几排坐的都是苏联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布莱希特不是坐在后面一排中间，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梅兰芳演讲吗？

1983年8月18日改定

梅兰芳与新加坡一段缘

“梅先生到过新加坡吗？”

这是《中国京剧史》主编胡冬生同志前几年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冬生兄是我的学长，当年我们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他读历史系，我读西语系。他让我考证一下。我想他大概是要把这事确定后写入《京剧史》(修订本)吧。



梅兰芳(左三)在欧洲一火车站与余上沅、吴邦本及接待人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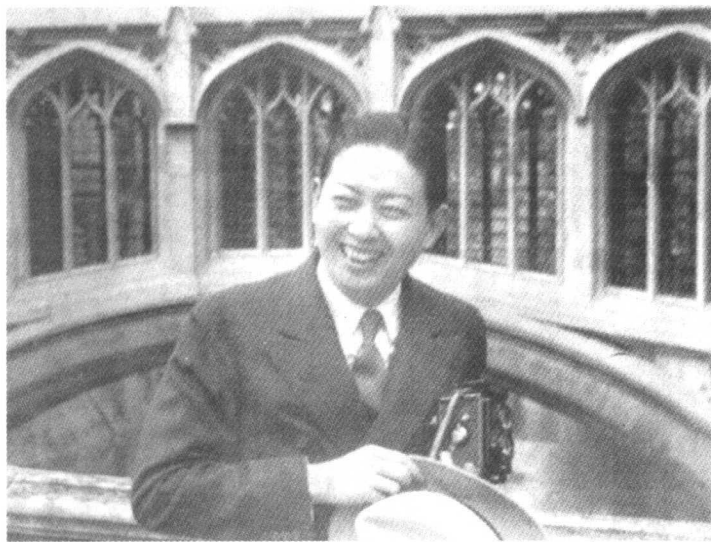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 1935 年访苏演出后，跟余上沅教授于该年 7 月赴欧洲考察戏剧，后从英国经埃及、印度回国。那一次他是否有可能路过新加坡呢？由于父亲生前未曾提过此事，我一时不敢贸然答复冬生兄。

不过，这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脑际，使我总想解开这个谜。

去年夏天，我访问美国，常到图书馆去翻阅书刊，浏览海外有关京剧和

我父亲的文章。一日居然从新加坡的《联合晚报》1987年10月28日那份的“大特写”版面上发现一篇署名张生的文章，题为《锣鼓喧天不开台——戏剧大师梅兰芳与新加坡一段缘》，并附有父亲在新加坡跟接待他的人员合影的两张照片。这真叫我惊喜万分。

文章前有大字标出的这样一段话：“被誉为‘中国伶界大王’和‘京剧第一名旦’的梅兰芳，虽然已辞世26载，他的表演才华，至今仍为中外人士所津津乐道。梅兰芳曾三度赴日本演出，日本文艺界称赞他的表演艺术为‘梅舞’；美国当局还颁赠‘文艺博士’的荣衔给他……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梅兰芳曾经到过我国，他还表示有意来狮岛演出，可惜，这个愿望最终并无实现。那已经是一甲子以前的事了……”



梅兰芳在欧洲留影

正文开首写道：“梅兰芳博士生平的最大宏愿，便是到新加坡演出，他不是想来南洋淘金，而是为新加坡的京戏广结戏缘。”1924年〔应为1935年〕，梅兰芳由苏联归国，转道欧洲路经新加坡，曾同当地的侨领、娱乐界同人等，考察演出

剧场结构和舞台设施，并游览各处名胜。那是63年前的事了，能够知道的人于今已寥寥无几。

继而提起已故漫画家马骏1956年发表在《夜行报》上一篇题为《梅兰芳在星洲》的文章，曾对梅氏一行人行踪有过详尽的报道，并摘引了其中一段：

忆起 32 年前(1924 年)[应为 1935 年],中国之宝——梅兰芳,初次出国,由苏联经欧洲回国时,路经新加坡,曾在本地参观剧场,漫游市区之往事。……梅兰芳回国时,在厦门之黄伯权先生,致电本坡王丙丁先生,信中言及梅氏将路经星洲,嘱请友好招待之。梅氏抵达印度时,又致一电予本坡雷江岩,请他于意邮船“康脱罗索”号抵新时上船接待。

不数日,本地侨领李先前等十余人登轮迎迓。这位中国伶界大王、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时年 30 岁)[应为 42 岁],及其秘书余上沅在众人陪同下登岸畅游,各侨领设筵款待,并邀同游植物园,参观南国特产胡姬花等。

当年陪同梅氏考察剧场和游览名胜者,有侨领李先前、王丙丁、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刁作谦、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庆年、新加坡银行经理周莲生、广东省银行经理王盛治、前快乐世界经理雷江岩、大经纪股份丘继显等人。

据当时考察后的意见,维多利亚纪念堂是英国古典型小剧场,建筑结构颇能符合京戏演出条件,其缺点是座位太少,容纳观众不多,舞台的调度与深度,演京戏还不大理想。

当时新建的天演舞台,旧称庆升平,大华戏院现址,舞台够阔,惟后台太浅,也不是京戏演出的好场所。比较适宜京戏演出的,他认为还是首都戏院,其建筑结构,颇适合演传统戏要求,舞台前后,够阔够深。

关于票价问题,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暂定一元、三元、五元等三种。

照 60 多年前新加坡的币值来说,上面所订的票价,不能算是大众化,但也不算是贵族化,喜爱京戏的人,他们还是有能力付得起的。

据笔者所知,梅氏 60 年前在上海演出,票价是一元、三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等六种,一场告满,大约可收两万多元,按照他们那次在新加坡所拟的票价,一元、三元、五元等三种,每日一场告满,充其量也不过三千五百元之数。

梅氏许下宏愿要来新加坡演出,当时未有后论,原因是什么,时隔数十年已无人知道。不过梅氏离开这里之前,临别他曾留言云:“以后如有机会,我一定要来新加坡表演,赚钱亏本是小事,我要让南洋侨胞真正欣赏到华族戏曲艺术的传统特点,为新加坡的京戏发展带来更繁荣的灿烂前途!”

在这段引文之后,张生先生补充道:“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梅氏与新加坡方面,双方曾有过接触。那时候,梅氏举家避难香港,消息传来,新加坡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老先生致函港友人康镜坡先生,托其前往与梅氏接洽率梅剧团南来新加坡义演,既可为国难略尽绵力,又可偿还当年许下的心愿,公私两便。但问题是梅剧团班底四十多人,此时均散居在上海[应包括北京],由于调集有很大困难,故无法成行。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56年组织工商访问团赴中国考察,据说团员之中,曾有人旧事重提,准备于抵达北京之后,再与梅兰芳接洽南来演出之事,相信梅氏为了了却30年前之心愿,或能乐意促成此行。然而工商访问团赴中国考察商业期间,也正是梅氏率领中国京剧团受聘日本之时,所以与梅氏接洽南来之事,竟又落空。五年后,梅兰芳逝世的噩耗由北京传出,新加坡方面,闻者在哀悼之余,莫不深感惋惜!”

接下来该文详细介绍了我父亲的生平事迹和访日访美访苏演出的盛况,最后结尾道:

梅兰芳博士逝世至今已有26载了,他身后遗下的剧目甚为丰富,艺术价值很高;他的表演艺术,给人的影响太大了。

想当年,日本文艺界称誉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为“梅舞”,美国的“梅热”疯狂地为他的表演艺术所折服,竟一厢情愿地赠送了“文艺博士”的荣衔给他,说他离开了舞台,他的生命将失去意义!

他的《贵妃醉酒》,在今日的日本和美国,仍盘旋在大量“梅迷”的脑际间犹未消失;尤其在美国各地的京戏票房,除了华族票友扮演的“杨贵妃”之外,还有不少高鼻深眼粉墨登台演唱的“洋贵妃”,而且是英语唱出的,不管是用中州韵白,或用英语韵白唱的,他们

都唱得很动听,很受人欢迎。

也许有人会这么想,假如梅兰芳当年许下到新加坡演出的心愿,真能实现,那么我国的京戏发展前途,必然也会发射出灿烂奇异的光彩!这里惟一的京戏票房——平社,今日至少也会出现一些“印度贵妃”或“马来贵妃”吧?

俗话说无独有偶或无巧不成书。葆玖弟近日转给我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刊物《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内有该馆纪清彬同志编选的《梅兰芳访苏档案史料》一文,收了当年来往的92封电文。我翻阅时又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其中有一条是驻新加坡领事馆1935年4月13日致驻苏大使电,全文如下:

新加坡殷商陈嘉庚拟请梅兰芳博士回国过新时留演十日,筹助其创办厦门大学经费,陈君除供全膳宿外,应酬国币若干,乞商梅君电复。刁作廉。十三日^①

发电人刁作廉的“廉”字似应为“谦”,恐系误排。由此我估计父亲当年在莫斯科演出时听到这个消息,便萌生了访欧回国时新加坡一行的念头吧。

上述的张生先生的文章和刁作谦先生那封电文两相印证,我现在可以满有把握地告知冬生兄,老爷子确实到过新加坡,时为1935年,现有文有相片为证,没错儿!

顺便在这里再补充几句。

尽管我父亲生前没能到新加坡演出,他的弟子胡芝风女士倒是在1994年应新加坡天韵京剧社聘请为艺术顾问,前去协助该社为纪念先父百周年诞辰暨该社成立两周年的双庆演出。8月13日和14日,该社演出了两场,剧目有《空城计》、《大登殿》、《奇双会》、《将相和》、《凤还巢》、《贵妃醉酒》、《廉锦枫》、《生死恨》、《霸王别姬》等剧,胡芝风女士参演了《霸王别姬》和《贩马记·写状》。参与演出者有毛威、侯深湖、陈韵、戴镜湖、侯勤等业余京剧

^① 见《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第20页。